

## 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共時與歷時考察<sup>\*</sup>

<sup>1</sup> 李艷芝    <sup>2</sup> 吳義誠

<sup>1</sup> 浙江師範大學/浙江大學    <sup>2</sup> 浙江大學

過去三十年來，一些學者根據漢語方言中「量+名」短語可作有定理解的現象，認為量詞在功能上相當於英語的定冠詞。本文通過對幾種南方方言（吳、湘、閩、粵等）的調查以及漢語量詞發展歷史的梳理指出：(1)英語定冠詞 *the* 是語法化了的有定標記，[*the+N*]結構無需語境支持即可作為有定表達式，體現了定冠詞行使語法功能的恆常性；(2)南方方言中「量+名」結構或光杆量詞脫離語境時與「有定性」沒有任何關係，而在語境中既可作有定亦可作無定理解，具有很強的隨機性；(3)光杆量詞、光杆名詞、「量+名」短語與「數+量+名」短語做有定解讀時，不能把「有定性」強記在某一成分如量詞、名詞或數詞名下，因為這些表達式本質上都是依賴語境表達指稱意義的語用現象。

關鍵詞：量詞、冠詞、有定性、語用現象、演化過程

---

<sup>\*</sup> 本課題得到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學項目（人文社科類）(No. Y201636234)的支持。作者感謝各方言聯繫人與合作人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意見。

## 1. 前言

量詞是漢藏語系語言區別於其他語系語言的一大特徵。過去三十年來，漢語量詞成了海內外語言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就漢語量詞的本質屬性來說，已有文獻呈現出兩大對立觀點：多數學者認為，漢語量詞總體上是有語義內容的實詞或體詞，即「實詞說」(參呂叔湘 1979；朱德熙 1982；黃伯榮、廖序東 2002；邵敬敏 2007；張斌 2010；胡裕樹 2011 等)；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漢語量詞尤其是南方方言裏的量詞是缺乏可描述的語義內容、主要行使語法功能的功能詞，即「冠詞說」(參 Cheng and Sybesma 1999, 2005；劉丹青 2005；陳玉潔 2007；Huang et al. 2009；Gebhardt 2011；Li 2013；董秀芳 2013 等)。「冠詞說」的主要觀點是：漢語的量詞具有限定功能，並且逐漸向類冠詞或冠詞方向發展，並在某些南方方言中語法化完成。例如，基於石汝傑、劉丹青(1985)一文的調查結果，劉丹青(2005:7)明確提出，蘇州話量詞具有定指用法，在一定的語用環境中可以單獨與名詞組合用來定指某人某物，如「本書」相當於英語的 *the book*，並且這種用法在口語中相當廣泛；「用作關係從句標記時仍保留著有定性」，其作用「相當於定冠詞」。不難看出，劉文認為「有定性」(definiteness)是蘇州話量詞的內在屬性，所以功能上相當於英語的定冠詞。這一觀點似乎為語言學界廣為接受。

然而，通過實地調查與分析我們發現，蘇州話量詞的所謂「定指」功能，並不是由量詞本身體現的，而是一種強烈地依靠語境表達指稱意義的語用現象。換句話說，與英語的定冠詞不同，「有定性」遠非是量詞的內在屬性，將漢語方言裏的量詞等同於英語裏的定冠詞，實質上是將語用現象誤作語法現象的結果。

本文的組織結構如下：第二部分，通過方言調查，從共時層面揭示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實際使用情況；第三部分，從歷時視角探討漢語量詞的演變途徑；第四部分，介紹量詞範疇的發展與存在價值；第五部分，總結並探討漢語量詞的本質特徵與未來發展方向。

## 2. 漢語方言中的量詞

### 2.1 「量名結構」獨立使用的條件性

盛益民(2016)最近指出，至少有 37 種漢語方言存在定指量名結構，並且收集到的文獻報導中有定指量名結構的方言已經超過 50 種。然而一直以來，學者們將量詞界定為冠詞基本上是基於幾種有限的南方方言材料，「冠詞說」的主要佐證為南方方言中（如粵語、吳語等）的「量+名」短語。學者們對該短語也有不同解釋。一般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該短語有時表達有定性（如動詞前位置），有時表達無定性（如動詞後位置）。以廣東話為例：

- (1) *Keuih maai-zo Gaa ce.* (Matthews and Yip, 1994:93)  
佢 賣 咗 架 車  
‘他賣了一輛車/這輛車。’

Wu and Bodomo(2009)指出[CI+N]短語並不像冠詞那樣無條件地表達有定性，因為「有定性」根本不是漢語量詞的內在屬性。只有在一定上下文和語用條件制約的情況下，光杆[CI+N]短語才能表達有定性。這在吳語方言如富陽話裏也可以得到印證（參 Li and Bisang 2012:351），如：

李艷芝、吳義誠

- (2) *khua kulæ, [bu tshots] pəʔ ia kua-iʔ die.*  
快 過來 部 車子 被 佢 掛 了 㗎  
‘快過來，這輛車被誰給刮了。’

- (3) *papa, [tsəʔ kiu] ɛankan san maobiŋ die.*  
爸爸 隻 狗 像看 生 毛病 㗎  
‘爸爸，這隻狗好像生病了。’

- (4) *kintsɔ uæ lə Bænlu lan, [tsəʔ leŋthæ] tʃhi*  
今天 回來 半路 上 隻 輪胎 去  
*phaʔ iɔ die.*  
破 了 㗎  
‘今天在回來的路上，這個車胎爆了。’

此外，有些經常被用來證明量詞具有冠詞性的例子，實際上都可以證明量詞的有定解讀強烈地依賴上下文語境，即語用限制，如：

- (5) A: 買 雙 鞋。  
B: 哪 雙？  
A: 雙! ((用手指鞋)：[這/那]雙！)  
(義烏，陳興偉 1992：206)
- (6) A: 你哪隻腳疼？  
B: 隻疼。((用手指腳)：[這]隻疼。)  
(蘇州話，石汝傑、劉丹青 1985：162)

事實上，陳興偉(1992)明確指出，上述義烏方言例句中所謂的有定性量詞，是省略指示代詞和數詞的結果，即這種有定解讀並非由量詞體現，而是由一定上下文語境提供的。<sup>1</sup>

漢語內部有七大方言區，有些方言之間差異較大，有些方言差異較小。就名量詞來說，北方方言內部差異較小，南方方言差異相對較大，但這主要體現在句法功能上，語義特點南北基本一致。有些學者根據 Bisang(1999)有關「quasi-article」的提法進一步論證很多方言量詞正在經歷一個不斷演變為功能詞的語法化過程，甚至已經演變為準冠詞或定冠詞（參見劉丹青 2005；陳玉潔 2007；Huang et al. 2009；Gebhardt 2011；Li 2013；董秀芳 2013），事實上這也是對作者原意的曲解。據 Bisang 本人與筆者的通信說法，由量詞的缺乏強制性(lack of obligatoriness)、不同語言中既可表定指又可表不定指的靈活性可見，量詞並非冠詞。

由於相關文獻中討論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吳、湘、閩、粵中，我們就從這幾種方言裏各選取代表性方言作為調查對象，用實際語料證明量詞的「冠詞說」站不住腳。具體調查的目標方言有：吳方言，以蘇州、上海話為代表；粵方言，以湛江、河源話為代表；湘方言，以湘鄉話為代表；閩方言，以海南文昌、瓊海話為代表。<sup>2</sup>

---

<sup>1</sup> 這和漢語裏的數量短語在一定語境下也可作有定解讀是一樣的道理，如「倆老師早退休了」中的[倆老師]應該理解成有特定的指稱對象。

<sup>2</sup> 作者十分感謝各方言聯繫人葉蘭（蘇州話）、張夢涵（上海話）、陳怡君（粵語）、潘夏星（湘鄉話）、楊望龍（閩語）以及各方言區被調查人的無私幫助與合作。除蘇州外，其它各方言區被調查人總體情況為：上海地區（25 至 35 歲 6 人、50 至 60 歲 6 人、64 歲 1 人，共 8 男 5 女）、湛江坡頭地區（24 至 30 歲 7 人，50 歲左右 6 人，60 歲 1 人，72 歲 1 人，共 8 男 7 女，均本地成長，多數無長期在外經歷）、河源地區（30 歲以下 1 人，50 歲左右 2 人，70 歲左右 2 人，共 2 男 3 女，均無長期在外經歷）、湘鄉地區（30 歲以下 1 人，40 歲以下 1 人，55 歲以下 2 人，70 歲以下 1 人，共 3 男 2 女，均土生土長，4 人生活在農村）、海南文昌、

李艷芝、吳義誠

由於蘇州方言是「量詞相當於定冠詞」論說的源頭，我們就主要以蘇州方言數據為主，輔以其它方言資料來論證這些方言量詞的本質。我們的被調查對象都是土生土長、隨機分佈、多數年紀較長的本地人。

表 1 蘇州方言量詞前指示代詞使用方式調查表

蘇州 方言	總計： 107 人	年齡段	人數	使用「這 /那」指 示詞	可省 略， 有條 件	不省略	
						不能 省略	一般 不省 略
		20-39	28	28	15	5	8
		40-59	43	43	32	6	5
		60-79	32	32	22	6	4
		80-99	3	3	2	0	1
		未知	1	1	0	0	1

由表 1 可知，蘇州話的被調查人都認為量詞前需要表示定指功能的指示代詞「這/那」(𠵿/該/歸)，占 100%；表示省略指示代詞是有條件的有 70 人，占 65.42%；表示不省略的有 36 人，占 33.64%。前文提到，劉丹青(2005)視蘇州話量詞為定冠詞的主要依據為石汝杰、劉丹青(1985)關於蘇州話量詞的調查結果。鑒於此，我們又讓這 107 位被調查人對石、劉文中的以下例句做了語感接受度測試。

---

瓊海、海口地區(24 至 30 歲 7 人，50 歲以下 2 人，70 歲以下 2 人，共 8 男 3 女，均土生土長，5 人生活在農村)。此外，湛江話語料由浙江大學博士生陳怡君提供，瓊海話語料由浙江大學博士生楊望龍提供。例句中文字下方波浪線表示該字或為記音字，本字不詳。

蘇州話

- (7) ? 隻腳痛得來。 (我的腳痛極了)
- (8) ? 杯茶泡得發苦葛哉。 (這杯茶泡得發苦了)
- (9) ? 條魚葛鱗片刮刮脫。 (把這條魚的鱗刮了)
- (10) ? 隻檯子葛賣相蠻靈葛。 (這隻桌子樣子挺好看的)
- (11) ? 倅看看種場面看！ (你瞧瞧這種場面)
- (12) ? 我去叫阿三來修一修扇窗。 (我去叫阿三來修修這扇窗戶)
- (13) ? 塊讓俚吃脫吧！ (這塊兒讓他吃了吧)
- (14) 甲：倅哪隻腳痛？ (你哪隻腳痛)  
? 乙：隻痛。 ([這]隻痛)
- (15) 甲：點魚殺好哉。 (魚都殺好了)  
? 乙（檢查以後說）：條葛鱗片勸刮清爽脫。 (這條魚的鱗沒刮乾淨呢)
- (16) 我歡喜倅上趟件。 (我喜歡你上次那件衣服)
- (17) 甲：哪隻是阿黃？ (哪隻是阿黃)  
乙：就是剛剛走開隻。 (就是剛剛走開的那一隻)

經過對 107 位蘇州本地人的初步調查，我們得知：由於缺少語言環境或定指成分「該個(這)」，「歸個(那)」，他們覺得(7)-(15)很彀扭，只能基本理解；(16)-(17)可以接受，即在交際雙方都熟悉的言語環境中，雙方都清楚所指之物，或者說話人用手勢輔助表義的情況下，可以省略數詞和名詞中心語。據被調查人說，蘇州人很喜歡使用手勢語進行輔助表達。這種情況只能理解為語用環境致使的活用，而不是量詞本身功能的轉變。單就(14)-(17)四句來看，視蘇州話量詞與英語定冠詞功能對等的做法也不妥當，因為作為語法詞的冠詞是不能單獨使用的。此外，劉丹青(2011:295)還以像(14)「隻痛」一樣的句子為例，提出「吳語量詞表定指時還可以單獨充當主語」，後來(2012:295)又用「張是啥個紙頭？」(這張是什麼個紙頭?)一類句子為例，強調蘇州話量詞能夠「單獨做論元」，即單獨出現在主語和賓語等句法位置上。不難看出，劉先生對這種毫無疑問的省略現象，一說是「量詞的作用相當於定冠詞」，又說是「量詞可單獨做論元」，這些陳述本身就自相矛盾。

事實上，石汝傑、劉丹青(1985:160, 162, 163, 166)也明確指出，在一定語用環境中，蘇州方言量詞可以與名詞單獨組合用來定指。通過對蘇州方言的實地調查，他們還實事求是地指出，「發音合作人也往往不承認有這種用法，而只承認指別詞跟量詞修飾名詞的用法，如『搵件衣裳』、『搵隻腳』。非得舉出實例來，他(發音合作人)才會點頭稱是，說確實能這麼用」(雙引號內容為原作者所加)。石、劉文還多處指出，「量+名」的定指用法只有「在語言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方可使用，而且是省略了量詞前面的指示詞或數詞的結果。由此可見，兩位作者對量詞定指用法的描述與我們的考察結果完全一致。兩次考察結果還說明，蘇州話量詞在過去三十年裏並未發生本質性變化。具體來說，兩次調查結果都表明：(1) 在蘇州人的語法知識裏，「指+量+名」結構是表達有定性的主導性結構；(2) 與指示詞或定冠詞不同，量詞本身並不具有「有定性」這一語法



屬性；(3) 光杆量詞或「量+名」短語作有定理解時受語用環境制約，<sup>3</sup>如多出現在主語位置或明晰的上下文裏等因素。正因如此，與英語裏諸如 *the book* 之類的 [the+N] 結構不同，蘇州話裏諸如「隻腳」之類的「量+名」結構無論表達定指與否，都與其所在語境有關。

同時，我們還對其它幾種相關方言進行了調查（部分例句選自蔣穎 2009），具體如下：

上海話

- (18) 我（葛）隻腳痛澀特了。（我這隻腳很疼）
- (19) （葛）隻錄音機啥甯內跑特了？（這個錄音機是誰拿走了）
- (20) 講起（葛）隻蛋糕麼，想想好笑呃。（講起那隻蛋糕麼，想想就好笑）
- (21) 葛塊黑板掛了阿哩的好？（這塊黑板掛在哪裏好）
- (22) 伊（葛）雙啊子落特最稀奇了。（他的那隻鞋子掉的最稀奇了）

據我們對 13 位上海本地人的調查，上海話中量詞前的指示代詞省略與否與量詞的句法位置、前面是否有人稱代詞、不同的量詞本身、語用環境等都有關。如位於句首，常用量詞「隻」前可以省略限定詞，其它量詞前省略則彆扭；有些量詞前雖無

---

<sup>3</sup> 「量+名」短語、光杆量詞、名詞短語、光杆名詞等表達式在一定的語境裏作有定解讀時，需受「熟知度」(familiarity)這個語用原則的制約（參見 Li and Bisang 2012）。

李艷芝、吳義誠

限定詞，但需有人稱代詞；量詞「篇、塊、張」前限定詞一般不省略；上下文語境中量詞前無限定詞，因為談話人之間已知所指事物究竟是哪一個，否則不能省略。此外，量詞的出現與否甚至可以強調不同的語義。不管具體情況如何，可以看出，限定作用至少不是量詞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在語用條件下「量+名」短語可作有定理解是事實，但將「有定性」記在量詞的名下顯然是錯誤的。

湛江話

- (23) 我今日喫了隻蘋果/我今日喫隻蘋果嘢。(我今天吃了一個蘋果)
- (24) 攤本書出來俾我。(拿本書出來給我)
- (25) 碟餸我喫嘢。(這碟菜我吃掉了)
- (26) 碗湯你飲嘛啊？(那碗湯你喝了沒有)
- (27) 場戲好好睇啊！(這場戲好好看啊)
- (28) 件衫好靚啊！(這件上衣好漂亮啊)
- (29) 就是啱啱走果隻。(就是剛剛走開那隻)
- (30) (個)月光好圓啊，我哋出去睇月光咯。(月亮好圓啊，我們出去看月亮吧)

我們調查了 15 位湛江坡頭地區人，他們指出例(23)-(30)都省略了指示代詞「這」、「那」，條件是：交際雙方都清楚的情況下，可以不用表定指的指示代詞，如例(25)-(28)；量詞前面為數詞「一」時，數詞可以省略，如例(23)-(24)。此外，所有這些省略的例子都可以加上指示詞。表示近指（說話人與所指事物距離近，都能看到或知道）或者用手勢指出具體是哪一個的情況下也可以省略指示詞。倘若賓語要省略名詞中心語，必須有「指示詞+量詞」結構來代替，這時不能省略指示詞「這」、「那」，如例(29)。有趣的是例(30)，第一個「月光」前有量詞「個」，而後一個「月光」前不用量詞。被調查對象指出，第一個「月光」前的量詞可有可無，加上是為了強調當時情景下的「[那個]月光」。倘若這裏的量詞「個」具有定指功能，相當於定冠詞 *the*，那麼後一個名詞「月光」前也應該加量詞「個」。

河源話

- (31) 你件衫都幾好。(你那件衣服也很好)
- (32) 你棚牙幾奇整。(你這口牙多齊整)
- (33) 我本書唔好，借你本睇下。(我這本書不好，借你那本看看)
- (34) 桶油足夠一百人食一個月。(這/那桶油足夠一百個人吃一個月)
- (35) 為咗件衫，佢喊咗幾場。(為了一件衣服，他哭了幾場)

李艷芝、吳義誠

據 5 位地道的河源地區被調查人解析，例(31)-(35)的量詞前都可以省略指示代詞「果(那)」、「伊(這)」。省略原因是簡潔，條件為必須是交際雙方的共知信息，或有手勢輔助表達。

湘鄉話

- (36) 咯雙鞋子是哪個格？（這雙鞋子是誰的）
- (37) 佢擔桶子爛咯哩。（那擔桶子爛掉了）
- (38) 件乖太衣衫哪個咯？（那件漂亮衣服是誰的）
- (39) 幫我抬下隻桌子。（幫我抬一下這/那張桌子）

我們對 5 位湘鄉方言使用者進行了調查，他們指出湘鄉方言一般用「咯(這)」、「佢(那)」表示定指，只有在雙方共知信息的情形下可以省略指示詞。

同時，我們還對海南文昌、瓊海、海口等地閩南語中的此類情況進行了調查，11 名被調查人一致認為：有時量詞可以單獨與名詞搭配使用，但前提必須是所指距離近，或者手勢指出，或者談話雙方共知。

總之，所有的調查結果一致顯示：量詞本身並不表示「有定」或「無定」。「有定性」是定冠詞而非量詞的內在(inherent)屬性，是一種較為恆定(constant)的語法現象。在中性語境裏，英語通常使用定冠詞加名詞來表達有定，所以講英語的人看到 the book 類表達式絕不會感到彆扭；而漢語通常使用指示詞加量名短語表示定指，所以即使講蘇州話的人，聽到或看到「指+量+名」結構（如「搵件衣裳」、「搵隻腳」）都不會感到彆扭，因為有定性可謂是漢語指示詞的內在屬性。無論是石、劉文還是本文中的調查對象，之所以都覺得(7)-(17)例很彆扭，正是因

為量詞不具備「有定性」這一語法屬性，脫離了明晰語境，這些例句中的「量+名」結構就不易存活。石、劉(1985:166)一文提到王力先生在《中國語法理論》中把蘇州話指示詞「搿」(書中寫作「格」)跟英語冠詞 *the* 類比，認為這種做法「也許不怎麼妥當」。王力先生應當是對的，他比較的是兩種語言成分在行使語法功能方面的恆定性特徵，而非受語境因素制約的隨機性特徵。

## 2.2 量名結構及其相關變調

漢語方言量名結構單獨使用時會伴隨不同形式的變調，有些學者據此將變調（尤其是量詞本身變調）看作量詞功能轉變的主要依據（參游汝杰 1981；錢奠香 2002 等）。然而，我們發現，定指環境下使用的「量名結構」變調形式、位置均不同。甚至有些語言中，無論何種情況，表定指的「量名結構」均不變調，如越南語等。可見，「變調說」並不是量詞定指功能的有效證據。相反，變調的形式、位置的差異性恰恰說明，這裡的「定指」並非涉及量詞或量名結構本身，而是涉及更大的語言單位。具體來說，漢語方言中量名結構的變調一般有如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量詞本身發生變調或變韻，如蘇州話（石汝杰、劉丹青 1985）、上海話（潘悟云、陶寰 1999）、溫州話（游汝杰 1981, 2003）、湘鄉壺天話（賀文平 2006）、漣水南祿話（王健、顧勁松 2006）、海安話（汪如東 2012）等。由此，一些學者認為，「指+量+名」結構中指示詞的定指功能轉嫁到了量詞身上（參游汝杰 1981；錢奠香 2002），量詞具有了定指功能，從而進一步語法化為功能詞。

問題是，此時量詞身上的調值是其本調吸收前面指示詞聲調產生合音的結果，還是其它原因導致的音變還有待進一步核實；即便是合音的結果，也不能得出「量詞具有定指功能」的

必然結論，因為合音後的「量詞」形式與省略指示詞前的量詞並不是同一個東西。例如北京話的「不用」合音為「甬 pəŋ35」(區別是這裏用另一個漢字形式表示了合音後的詞，而「指示詞+量詞」合音後依然使用量詞本來形式表示)，我們不能說「用」的功能嫁接到了否定詞「不」上，故否定詞「不」不僅具有否定功能，還具有「用」的功能。再譬如，義烏話中表量少約數的「指示詞+兩+量詞」結構，省略指示詞後的「兩」變讀為高降調(陳興偉 1992)。據以上變調理論推測，這裏的「兩」應該也具有定指功能。顯然這是很難成立的。

第二種，量詞本身並不發生變調，量詞前的那個音節發生變調，如海南瓊海話。據我們對瓊海本地人的調查發現，瓊海話現在使用的量名結構應該是由其原型結構「X+奚+量(+名)」結構省略而來，進而造成量詞前的 X 發生變調，變調以後的 X 與量詞一起構成定指結構。也就是說，量詞本身並不單獨表示定指，而是「X+量(+名)」結構整體表示定指。也正因此，瓊海話中的「量名結構」一般不出現於句首位置。如：

- (40) 伊踢(het5> he:t5)張椅崩去。(他把這/那張椅子踢倒了。)
- (41) 伊講(koŋ42-425)條衫那故相。(他說這/那件衣服非常漂亮。)
- (42) 相相(ɕiaŋ21-215)隻狗是老王個。(比較漂亮的那隻狗是老王的。)
- (43) 《三國演義(ŋi42-425)》本書那故好望。(《三國演義》這/那本小說非常好看。)
- (44) 昨日有蜀架車趁我厝門頭駛過。我見(ki21-215)根排氣管一溜滴油去。(昨天有輛車從我家門前開過，我看見那根排氣管一路滴油。)

第三種，無論是數量式還是定指式結構，變調規律相同，如海安話（汪如東 2012）。其中，量名結構處於主語位置上時，量詞一律變讀 213，同上聲調值；量名結構處於賓語位置上時，量詞則隨前面動詞聲調的高低而變化，一般隨前字變讀輕聲。

(45) 張桌子放啊外的。tsã<sup>21/213</sup> tɛyaʔ<sup>33</sup> tsɿ<sup>3</sup> fã<sup>33</sup> ŋa<sup>3</sup> ve<sup>21</sup> tiʔ<sup>1</sup>

(46) 請人要借張桌子。te<sup>h:213</sup> i<sup>35</sup> zɕ<sup>33</sup> io<sup>33</sup> teia<sup>33</sup> tsã<sup>21/3</sup> tɛyaʔ<sup>33</sup> tsɿ<sup>3</sup>  
（轉引自汪如東 2012）

第四種，量名結構出現在動詞前或後都可以表達定指或不定指，並且都按照規則變調或發音規則相同，如績溪嶺北話、漣水南祿話等（王健 2013）。

第五種，同處於定指環境中，量名結構既可以出現在動詞前位置，也可以出現在動詞後位置，但是無論前後，都讀本調，如衡東新塘話、漣源話、新化話等（王健 2013）。

第六種，量名結構處於動詞前表定指且變調，處於動詞後表不定指且按照規則變調，如揭陽話等（王健 2013）。

從以上多種變調情況可以看出，變調與定指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將變調後的「量詞」界定為具有定指用法的定冠詞或類定冠詞都是強制歸納的結果。

## 2.3 漢語方言量詞的其它特點

方言量詞與漢語普通話量詞的一個共同點是，數量眾多且語義特點明顯。這說明量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演變為定冠詞的可能性。從跨語言角度來看，定冠詞數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如英語中只有一個定冠詞 the，阿拉伯語只有ال（讀作 al- 或 el-），葡萄牙語中有 o、a、os、as，德語中有 der、die、das、des、dem、den 等。

數量上，我們統計了多地漢語方言志出現的常用名量詞，結果顯示：浙江《桐廬方言志》23 個名量詞；浙江《海鹽方言志》41 個名量詞；江蘇《蘇州方言志》88 個名量詞；福建《永春方言志》98 個常用量詞中有 75 個名量詞；除了與共同語相同的量詞外，福建《廈門方言志》列舉了 18 個與普通話不同的量詞；甘肅《山丹方言志》有 75 個常用名量詞等。<sup>4</sup>

語義特徵上，這些方言中的量詞大部分與漢語共同語中的量詞相同，少部分是具有方言特色的量詞，如吳方言蘇州話中「肚皮」（一肚皮氣）、「鑊」（指古代煮牲肉的大型烹飪銅器之一，作量詞，相當於「鍋」，如：一鑊飯、一鑊山芋）、「窠」（指昆蟲、鳥獸的巢穴，作量詞，如：一窠小雞、一窠蛋）等。福建永春話中「葩」（指草木的花，相當於「朵」，如：一葩花）、「莧」（指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莖，作量詞相當於「叢」或「棵」，如：一莧草）、「甌」（指一種器物，用作量詞，同「杯」，如：一甌茶）。

---

<sup>4</sup> 有學者提出兩個問題：一、量詞數量眾多，是否某個或某兩個量詞可能進一步語法化為定冠詞，而其它量詞繼續保留量詞的用法？二、一種方言中沒有具有定冠詞用法的量詞不代表另一種方言中也沒有。

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量詞的泛化。第一個問題參見本文 3.3 的討論。據我們調查，至少目前尚未發現第二個問題所述情況。具體來說，我們尚未發現可以與任意名詞無限制搭配的通用量詞。以湘語與粵語為例。湘語通用量詞為「隻」，可以與許多名詞搭配使用，如動物類和傾向於整體的植物類名詞等。但也有許多名詞不能與「隻」搭配，如傾向於部分的植物名詞，如不能說「一隻樹葉」，條狀的物體也不能，如河流、木棍、苦瓜等；此外，「書本」、「衣服」也不能搭配。這些名詞的量詞與普通話基本一致。粵語較為通用的量詞也是「隻」（現在「個」也較為廣泛使用，可能受到普通話的影響），可以搭配的典型名詞為動物類（如「隻貓」、「隻豬」、「隻牛」等）。有時，人也可以用「隻」，如「邊隻同學啊？哪位同學啊？」等。但是依然有很多名詞不能與「隻」搭配，如「（部）電視劇/（本）書/（件）衫/（條）褲/（塊）樹葉/（張）床/（塊）地板」等。植物類一般用「棵」，如「棵草/棵樹」等，表面扁平、細長的物體也不與之搭配，如「紙/地/被」等。可見，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問題在漢語方言中尚不成立。



廈門方言中「一枝旗」、「一葩燈」、「一領衫」、「一頂汽車」、「一隻飛機」等。這些方言特色的量詞多為古代漢語遺跡，保留了一部分原始色彩意義的語義特徵。

方言與漢語共同語中的量詞數量眾多，語義特點明顯、豐富，這與印歐語系語言中定冠詞的屬性、使用情況與發展演變路徑存在明顯差異，例如定冠詞一般由指示代詞發展而來，如英語的定冠詞 *the* 源於古英語指示詞 *þæt* 發展而來的 *that*，羅曼語(Romance languages)中的 *el*、*il*、*le*、*la* 源於拉丁語的指示詞 *ille*（陰性）和 *illa*（陽性）等。

## 2.4 其它民族語言的量詞特點

各民族量詞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特點，如貴州苗瑤威甯地區的苗語(Ahmao)，量詞不僅在語音、語義及語用上具有獨特特徵，在性、數、年齡、生命力(*animate*)等方面也都有其自身發展路徑(Gerner and Bisang 2010)。劉丹青(2008：341-342)從人類語言整體出發，認為與非洲班圖語系語言相比，漢語量詞分類功能並不很強，班圖語系語言將名詞分為近 20 個類別，每個名詞歸入其中一類並帶上不同的類別前綴，「類的系統性很強，理據性也比那種純粹約定俗成的性歸類要強」，但由於單複數常分立類別，所以不考慮數的語義類別不到 10 類，「以不到 10 類去覆蓋外部世界和人類認知的全部事物，難免有難以解釋之處」。使用分類詞/量詞的語言，量詞常比班圖語的類別前綴更多，而分類的系統性、理據性各語言相差很大。但無論如何，分類功能是各個量詞型語言的共性，也是量詞的主要功能。正因為量詞的分類功能明顯，量詞本身的類別義也很強，甚至經常可以代替核心名詞表達事物的類別，如壯侗語複合詞中可以和相關類別的名詞互換，*ko*<sup>1</sup>（棵）*rau*<sup>1</sup>（楓）=*fai*<sup>4</sup>（樹）*rau*<sup>1</sup>（楓），表樹量詞和表樹名詞互換而詞義不變，都表示「楓樹」（壯語核心名詞在前）。這些都證明

量詞/分類詞與印歐語系統中只有限定功能的冠詞不同，屬於不同的語法範疇，不必強硬歸併。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學者對量詞的「冠詞說」存有異議。陳玉潔(2007:520)指出，包括蘇州話在內的量詞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冠詞，它們「不宜被稱作冠詞，但鑒於它和冠詞的句法語義功能相似，我們稱之為類冠詞」。此外，在詳細探討了漢語量詞朝冠詞發展的演化路徑之後，她進一步指出，「粵語、吳語中量詞的作用同於普通話中朝連接性冠詞方向發展的指示詞。如果經過進一步發展，這些方言（粵語、吳語）中有定的『修飾語+名詞』類 NP，甚至所有的有定 NP 都要強制性加上量詞作為有定標記，可以說量詞已經徹底發展成了一個定冠詞。瑤族勉語中，量詞的用法已經發展到這一階段，可以稱為定冠詞了」（雙引號內容為原作者所加）。<sup>5</sup>且不說「類冠詞」的分析也存在一定問題，事實上，據毛宗武(2004)的考察結果，瑤族勉語量詞的用法基本與粵語、吳語方言並無太大差別。在毛宗武所考察的勉語用例中，除「數+量+名」結構、省略數詞「一」的「量+名」結構以及領屬關係的量名結構外，表示有定的「這/那+量+名」結構共有 105 例；而獨立使用的「量+名」結構僅有 28 例，但作者並沒有指出獨立使用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大，也沒有詳細給出獨立使用的具體條件。有趣的是，作者在說明勉語如何表達有定性時，共造了 9 個含有「小孩」的句子，其中使用「量+名」結構的僅有 2 例，而使用「指+量+名」結構的多達 7 例，如下：

- (47) a. 個小孩回來了。(p. 211)  
b. 個小孩個臉生了些瘡。(p. 214)

---

<sup>5</sup> 審稿人提出，從形式句法角度來看，如果量詞為冠詞，同時兼有指示詞(demonstrative)（如「這/那」）與量詞的功能，即 [demonstrative + classifier]，而指示詞(demonstrative)本身也被視為 D，那麼就出現了具有兩個指定詞的指定詞短語結構(DP)。這會給當代句法理論帶來一定問題。

- (48) a. 那個小孩自己洗個臉。(p. 214)  
b. 那個小孩哭哭嘴。(p. 237)  
c. 那個小孩吃吃一下就睡覺了。(p. 238)  
d. 那個小孩非常頑皮。(p. 250)  
e. 那個小孩又哭又笑。(p. 253)  
f. 那個小孩又白又胖。(p. 255)  
g. 那個小孩走得不快。(p. 266)

這些例句至少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在中性語境裏，「指+量+名」結構仍然是瑤族勉語表達定指的主導性結構，「瑤族勉語量詞已徹底發展成為定冠詞」的結論是不可靠的。

我們再看東南亞語言中量詞的情況。經統計，越南語中的量詞約有 161 個（張文界、黎克橋陸 2012），量詞一般也是名詞，甚至不少是兼類詞，如越南語的 *làng*，既是名詞「村莊」，也是量詞「村」：

- (49) *Xã có Ba làng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公社 有 三 村 少數民族

越南語中主賓語位置上獨立使用的量名結構既可表定指也可表不定指，且無論何種句法位置，量詞及其周圍音節均不變調。

泰國語量詞約 577 個(*Thai Classifier Dictionary* 2003)，量詞也可以兼類名詞。與越南語一樣，泰國語的量詞語義特徵也很突出，如泰國語的 *kan* 本指兩塊田之間隔開的地方 <坎儿>，後引申指手可以拿/握到的長條形物體，相當於漢語的「輛」、「把」，如：

- (50) *rod 1 Kan*  
車 一 輛

李艷芝、吳義誠

(51) rom      2      Kan  
雨傘      兩      把

(52) chon      3      Kan  
勺子      三      個

(53) tha-nuu      4      Kan  
弓箭      四      副

這些跨語言的數據均可證明，量詞是語言中具有明顯語義特徵的一類範疇，我們不必強行與其它範疇進行歸併。

總之，漢語方言與東南亞諸語言中，量詞的語義多樣性與語境依賴性清楚地表明，這些量詞很難語法化為具有純粹語法功能的限定詞(determiner)。從量詞的歷時演變軌跡來看，更沒有絲毫跡象顯示這麼大一個詞類經歷了一個從實到虛的語法化過程。一個鐵的事實是，從甲骨文到現代漢語，漢語至少經歷了約六千年發展歷史，量詞的數量依然不斷增加。總體上來講，量詞的語義內容也越來越精確。下面，我們就從歷時演變的視角梳理漢語名量詞的指稱性與（準）實詞性。

### 3. 漢語名量詞的歷時發展

從漢語發展史來看，漢語量詞主要是在名詞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中的度量衡量詞、集合量詞和時間量詞是產生較早的三類名量詞，是在滿足人類基本生產、生活和完整表達語義需求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三類基本量詞類別不僅在漢藏語系(包括一語三族，即漢語、藏緬語族、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在非漢藏語系(如印歐語系)中都有相當數量存在，因其內部與外部差異相對較小，本文不予深入討論。

本文集中討論發展程度差異較大的第四大類名量詞，即具有漢藏語系特色的個體量詞的性質(主要包括反響型量詞、性狀量詞、通用量詞)，進而反映漢語量詞的發展演變情況，並在此基礎上預測它們的未來走向。從歷時角度看，漢語名量詞的起源與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萌芽期(先秦時期)、過渡期(兩漢時期)和成熟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個體量詞在第三階段已開始強制使用，且出現了大量性狀量詞，如「口」、「面」、「朵」、「條」等。

### 3.1 名量詞的雛形

名量詞中有一類相對特殊的單位詞，即反響型量詞，一般被認為是名量詞的雛形。所謂反響型量詞(echo classifiers)，是指與被限定的名詞或動詞形式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量詞（橋本萬太郎 1985；戴慶廈、蔣穎 2005）。漢語中的反響型量詞並不典型，最初被認為是名詞的一類（王力 1980），僅在甲骨文、金文時期的先秦文獻中出現過，此後基本消失。而漢藏語系尤其藏緬語族一些語言中，仍有一定數量存在。如：

漢語

- (54) 羌百羌/俘人十又六人（殷墟卜辭）  
玉十玉/田十田（西周金文）  
牛十牛（《殷契粹編》190）

藏緬語

- (55) a. laʔ<sup>31</sup>    tã<sup>31</sup>    laʔ<sup>31</sup>    (波拉語)  
手        一        手  
          ‘一隻手’  
b. team<sup>55</sup>    ta<sup>31</sup>    team<sup>55</sup>    (獨龍語)  
橋        一        橋  
          ‘一座橋’  
c. ji<sup>55</sup>        thu<sup>31</sup>    ji<sup>55</sup>        (西摩洛語)  
房子      一        房子  
          ‘一棟房子’  
d. phun<sup>35</sup>    ta<sup>31</sup>    phun<sup>35/31</sup> (仙島語)  
桌子      一        桌子  
          ‘一張桌子’

例(54)中，數詞後的「羌」、「人」、「玉」、「田」、「牛」等與數詞前的名詞同音同形。從類型學視角看，它們與例(55)中的後一個名詞在句法功能上是相同的。許多研究量詞的學者將這些詞判定為「反響型量詞」(或拷貝型量詞、反身量詞)(李宇明 2000；戴慶廈、蔣穎 2005；蔣穎 2009 等)，並認為這些成分在句中只起句法作用，表語法意義，但不具概念意義。然而，漢語是一門表義語言，漢字是記錄漢語的工具，漢字是表義字，早期幾乎每一個漢字都能從其形體特徵判斷或考察出其意義來源。也就是說，尚處於語言發展初期的這種語言結構，真的會語法化如此成熟，只具有語法意義，而不具有任何詞彙意義嗎？例(55)中，數詞後的名詞與數詞前名詞完全一致，倘若後面的名詞真的完全沒有意義，僅僅起語法作用，為何偏偏選擇與數詞前名詞完全相同、又容易造成認知加工困難甚至冗餘的名詞置於數詞之後？是否可以任意選擇其它詞置於數詞之後？

蔣穎(2009:147)指出，反響型量詞具有專用黏著性，其語義始終指向名詞，句法上無法取代名詞與數詞結合。上古漢語名詞的計數方式靈活多樣，數詞可前可後，個體量詞可用可不用，反響型量詞通常兼有名詞的性質，且其量詞性依賴於固定的結構模式。這又說明，反響型量詞具有概念意義。假設將反響型數量名結構用「A+數+A」格式表示，該格式可以看作兩種表數結構方式的疊加：一是「A+數」結構，如「羊酪一、腸一、胃一」(《十三經·儀禮》)、「賜豕鼎一、爵一」(殷周金文集成 02778)；二是「數+A」結構，如「十又五牢」(甲骨文合集 34396)、「余命女政於朕三軍」(嚴可均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齊鐘銘》)。也就是說，這種格式的形成是人們表達量的需求與缺乏精確「量詞」表達的事實之間的矛盾造成的。這種矛盾之下，人們採用「複說法/重複法」來強調(或凸顯)和限制數詞與前面名詞之間的緊密關係，如「羌百羌」強調了「羌族的百人」，而不是其它民族的「百人」。這種現象用現代語言學術語可稱為「冗餘」或「羨餘」。但在量詞發展起步之初，這種重複是必要的，具有羨餘的價值，即同時滿足了表義充分與表數的需要。使用與名詞緊密相連的反響型量詞形式，一方面凸顯了數範疇，另一方面還完整表達了語義。從後來反響型量詞向具有性狀、性質、類別意義的非反響型量詞演變的方向來看，反響型量詞的出現為後來個體量詞語義不斷凸顯提供了句法位置和語義基礎。可以說，以名詞的反響形式構成量詞是個體量詞語法化的起始階段，也是名量詞發展過程承上啟下的階段。

有些語言(如仙島語)中，當出現「十」或「十」以上數詞時，[數+量]（這裏的量詞為單音節整體反響型量詞）結構前的名詞一般省略，即由「名+數+量」變成了「數+量」，且並不影響整個數量名結構的語義。然而，使用非反響型量詞的短語則不能省略名詞。這說明，反響型量詞對整個數量名結構的語義是有貢獻的。以名詞「腳」為例，如：

李艷芝、吳義誠

- (56) a. \*khji<sup>55</sup>      ta<sup>31</sup> tshi<sup>55</sup>      khji<sup>55</sup>  
           腳            十            腳  
           ‘十隻腳’  
       b. ta<sup>31</sup> tshi<sup>55</sup>      khji<sup>55</sup>  
           十            腳  
           ‘十隻腳’  
       c. \*ta<sup>31</sup> tshi<sup>55</sup>      xən<sup>51</sup>  
           十            隻  
           ‘十隻?’  
           (以上三例均引自蔣穎 2009)

這都從側面證明這種結構中的反響型量詞具有十分清晰的語義，且量詞語義和數詞前的名詞語義應該是一致的。

此外，上古漢語發展並非十分穩定，各種語義概念、句法結構、詞彙形式都處在不斷發展與更新之中。人們對新信息的表達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增強，然而有限的語言形式又束縛了社會新信息的有效表達。為了表義的需要，人們不得不嘗試採用一種不太成熟的，甚至囉嗦、重複，或者說主觀性極強的概念結構形式來滿足傳達某種信息的要求。但是，某種表達形式流行開來的同時，人們對社會、自然界的認識也不斷增強，頭腦中的概念系統也不斷完善，語言整體結構也自然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發展，以致先前不能完全表達清楚的概念信息得以表達，先前不成熟的語言結構在原有基礎上逐漸成熟，表達更加精細化、抽象化。需要說明的是，認為反響型量詞是名量詞的雛形，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名量詞都從反響型量詞發展而來。



### 3.2 名量詞的主力軍

名量詞中個體量詞(包括性狀量詞、通用量詞等)占絕大多數。個體量詞的發展程度代表了名量詞的發展程度，其中，性狀量詞的發展程度又代表了個體量詞的發展程度。漢民族語言對名詞的性質、狀態、屬性等信息的表達具有較高的要求。因此，個體量詞就是在突破反響型量詞的局限性(違反經濟性、簡明性)，滿足人們表義細緻化、分類明確化的現實要求，符合漢語發展特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個體量詞的數目逐漸增多。甲骨文時期除了反響型量詞，只有兩三個個體量詞，如「丿」、「人」、「屯(純)」等(張玉金 2001:20)；春秋戰國金文中，有4個個體量詞，如「邑」、「乘」、「兩」、「人」等(趙鵬 2004)；春秋《左傳》中有「人」、「匹」、「張」、「乘」、「稱」、「兩」等6個個體量詞(李佐豐 2003:47)；到了兩漢時期，增加到約50多個個體量詞(黃盛璋 1961)；魏晉南北朝時期，個體量詞(陪伴詞)122個(劉世儒 1965)；唐五代個體量詞約171個(曹芳宇 2010)等。

兩漢時期個體量詞的發展標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主要表現在：數量大增；量詞本身進一步分工；量詞開始用於構詞綴等(黃盛璋 1961)。魏晉南北朝時期，個體量詞已開始強制使用，標誌著名量詞的發展成熟。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大量的性狀量詞，如「口」、「面」、「所」等，還有通用量詞「枚」；數量名結構由先前的「名+數+量」為常式，變為魏晉時期的「數+量+名」為常式。伴隨著個體量詞的發展成熟，語法化過程也隨之開始，個體量詞不斷虛化，表現在：(一)參與構詞，成為新的構詞語素，如「車輛」、「書卷」、「個數」、「人群」等；(二)語義分工精細的性狀量詞增多，如「丸」、「粒」、「株」等；(三)出現通用量詞「枚」。性狀量詞的增多增強了表達的形象性和描寫的精確化，甚至抽象概念也可以通過量詞變得形象、生動而易理解，如「一顆紅心」、「一盞愛心燈」、「一片愛心」等。

李艷芝、吳義誠

但是，量詞的「語法化」與語言學通常意義上的「語法化」有所不同。語言學意義上的「語法化」，主要指具有語義內容的實詞在意義虛空之後，僅表達語法功能或僅做功能詞的一種過程或現象(Hopper and Traugott 2003)。值得一提的是，語言中每種詞類都扮演一定的語法角色，發揮一定「語法功能」，只是部分詞類僅發揮語法功能，不具有語義內涵；多數詞類不僅發揮語法功能，還具有明晰的語義內涵。但量詞的「語法化」有所不同，這裏的「語法化」是就個體量詞與名詞語義結合的疏遠對應關係而言的。量詞的語義始終存在，只是側重點有所變化。量詞與名詞一一對應，不具有與其它名詞結合的能產性的狀態處於語法化的始端；量詞與名詞對應擴大化，能與不同名詞結合，突出表現名詞某一方面特徵或語義，具有某種程度「量名」能產性的狀態處於語法化的中間；量詞與很多名詞有對應關係，量詞表現的名詞性質比較泛化，甚至很難判斷具體語義，處於語法化的末端。這種語法化態勢，可以用「兩頭細、中間粗」來表達，即大部分名量詞處於語法化中間階段，語法化初始階段的漢語量詞，如反響型量詞，基本消失，僅在其它藏緬語中依然存在，而語法化末端為通用量詞，且數量極其有限。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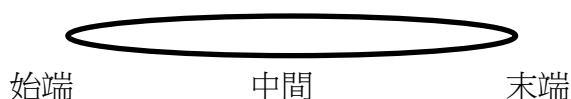


圖 1 量詞整體語法化態勢

我們認為，這種語法化不可能向「虛詞/功能詞」方向演化。本質上講，與其說這種關係是一種「語法化」關係，不如說它僅僅是一種有限的語義泛化過程。漢語名量詞的泛化(或稱「語法化」)的演化過程如下圖(參見蔣穎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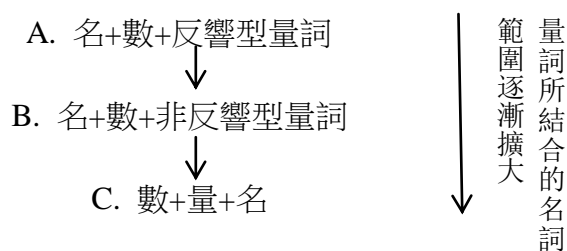


圖 2 漢語名量詞演變圖示

圖示中，A 階段的反響型量詞為個體量詞提供了發展空間，B 階段開始凸顯名量詞的總體語義特徵，C 階段名量詞開始發展成熟。反響型量詞來源於名詞，由名詞義轉而發展為量詞義，在語義功能上，由表事物轉變為表單位。A 階段的數量名結構，使得進入此格式中「反響型量詞」位置的其它詞具有了量詞性，即反響型量詞為其它類別個體量詞的大量出現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的句法位置，這是由語言的聚合原則決定的。在「結構賦義」的作用下，反響型量詞只在「羌百羌」這種格式中才具備名量詞的語法特徵，即稱量名詞的單位；而在其它結構形式中所謂的「反響型量詞」依然還是名詞。

名量詞語法化的關鍵在於確立一個較穩定的句法環境。在量詞泛化初期，作為靜態單位，非反響型量詞位置的聚合增強了量詞成為獨立範疇的傾向，同時也限制了量詞漫無目的地虛化為純粹虛詞/功能詞的可能性。

### 3.3 名量詞的泛化

通用量詞的出現代表了名量詞的泛化。顧名思義，通用量詞是能與很多名詞搭配使用的量詞，它處於量詞語法化的末端，語義十分虛化，但我們不能由此認為所有的量詞都將無止境地虛化下去。量詞的虛化是有限度的，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一、通用量詞的數量極其有限

真正意義上的通用量詞數量非常有限，中古時期有「枚」，近古至現代有「個」。它們的特點是適用範圍廣、形象性減弱、句法功能增強，甚至還出現了「超量詞」用法。

A·「枚」

中古時期通用量詞「枚」適用範圍很廣，後來逐漸變窄。《說文解字》中記載「枚，幹也」，指略粗於「條」的細枝。枝幹的特點是小而細長，故「枚」又引申為「銜枚之枚，為枚數之枚」等，「銜枚」指古代行軍時為保持肅穆無聲讓兵士們銜在嘴裏的小木條。此外，「枚」還可以表示馬鞭子，如「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左傳·襄公十三年》)；指鐘面上隆起的裝飾，即鐘乳，如「鐘帶調之篆，篆間調之枚，枚謂之景」(《周禮·考工記》)等。顯然，這些引申義都與「枚」的本義所指稱事物(細長樹枝)的性狀有相似之處(參見陳紱 2002)。先秦作品中，「枚」已作為一般量詞計量槍、石、弩等，漢代計量藥、鳥等，到了南北朝時期，「枚」的適用範圍最為寬泛(例句轉引自陳紱 2002)，如：

- (57) a. 黃魚一枚。(《吳志·薛綜傳》)  
b. 有石碑一枚。(《洛陽伽藍記》)  
c. 僕有劍一枚。(《魏文帝·送劍書》)  
d. 別有八艘艦九枚。(《宋書·武帝紀》)  
e. 獻……貂皮四百枚。(《魏志·陳留王紀》)  
f. 大棗四枚(劈) 麻黃十八銖(去節) (《傷寒論》)  
我棺中可著白張紙、筆兩枚。(《魏書·昭成子孫傳》)  
g. 金錯碗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碗一枚，可以服藥酒。(《全後漢文·又報嘉書》)  
h.

由此可見，可以用「枚」計量的事物已經擴大到包括動物、植物、建築物、自然景觀、書寫工具、交通工具等在內的幾乎所有事物，且這些事物與「枚」本義所指事物的特徵(小而細長)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之後，「枚」又經歷了一個範圍逐漸縮小的過程，到現代可以用「枚」來計量的事物一般僅局限於「郵票、釘子、獎章、戒指、顆粒」等，且這些事物還可以使用其它量詞計量。

**B·「個」**

「個(箇)」本義指竹枚，南北朝時與「枚」同時使用，且所指部位和形狀特徵一致。用作量詞時計量竹子的數目，如「竹竿萬個」(《史記·貨殖列傳》)，但很快「個」就用來計量其它事物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代漢語中，以至現在貌似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個」來計量。除計量以外，「個」還發展出其它「超量詞」用法，如現今對「個」身份的界定就有「指示代詞說」(趙日新 1999；Li 2013)、「助詞說」(周明強 2002)、「冠詞說」(劉丹青 2005、陳玉潔 2007)、「詞綴說」(王志武 1999)等。呂叔湘(1999[2010]:222)認為「個」有引進補語的作用，如：玩兒個痛快/弄個明白/弄個清楚。朱德熙(1982:121-122)、石毓智、雷玉梅(2004)認為形容詞或動詞前的「個」是程度賓語的標記，作用是把各種成分轉換為名詞性賓語，如：

(58) 你個沒良心的！

(59) 雨下個不停。

(60) 弄個水落石出。

(61) 一下讓你吃個飽

除了普通話以外，在一些南方方言中，如吳語瑞安方言、溫州方言等，「個」也是泛化程度最高的通用量詞，其與名詞的搭配也十分豐富。然而即使這一通用量詞也並不能與所有名詞搭配（如「\*個河」等），更不能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單獨與名詞搭配使用，如「\*個太陽」等。

這兩個通用量詞都是量詞與名詞結合泛化的表現，但並不代表所有的量詞都會泛化。此外，「個」的虛化方向也並非「冠詞化」，「個」的種種「超量詞」功能特徵與冠詞型語言中的「冠詞」（如英語的 *the/a/an*；法語的 *le/la/les/un/une/des*；阿拉伯文的 *ال*）並不相同。

## 二、通用量詞不可能取代個體量詞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出量詞「個化」問題，認為「個」會逐漸取代其它量詞，最終成為最通用的「萬能量詞」，如戴婉瑩(1984)，金福芬、陳國華(2002)等。然而，近期不少學者對「個」泛化問題提出質疑，如何傑(2008)指出量詞不會「個」化有幾個原因：（一）「個」表量是有限的，並不是所有的量詞都能用「個」來修飾，如「一個啤酒(瓶)」；（二）「個」通用容易出現歧義，如「一個幼稚園的孩子」；（三）同音容易造成歧義，如「一個箭/劍(支/把)」；（四）不能準確、精確表量，如不能精確表達度量衡、貨幣、容器等概念；（五）「個」的語義色彩單一，無法表達莊重、嚴肅、尊敬的情感色彩，也無法描繪客觀表量事物的形象特徵。同時她還指出，「『個』不能使其它的量詞失去固有地位而讓位於它，不能取代其它量詞的語義、語法作用」。因而，「量詞的『個』化不能實現」。但是，口頭交際需要量詞簡單化，書面語（特別是文學語體）又要求量詞確切、形象、生動，而量詞究竟如何發展，「最終還要看社會的需要」。張楨(2012)通過大量史料證明，量詞的新功能主要由不表明顯分類特徵、不具特殊色彩的「個」完成，而在計量和分類時，仍廣泛採用普通個體量詞。她還指出，近代漢語時期，「個」與普通個體量詞大致呈互補分佈，「個」的使用範圍擴

大、在一定條件下可代替普通個體量詞，是漢語量詞功能發展的結果。但這種變化並不普遍，僅局限在少於 1/600 的量詞比例之下，不代表「個」取代個體量詞，漢語量詞發展史上也沒有存在過「個化」問題。持類似觀點的還有王志芳(2002)、薛健(2003)、陳躍(2006)等。

此外，從信息理論角度來看，漢語個體量詞的存在有不容取代的作用：它們的出現和發展滿足了漢語言信息表達精確化、分類明確化的需要，因此是漢語言表達的必要形式和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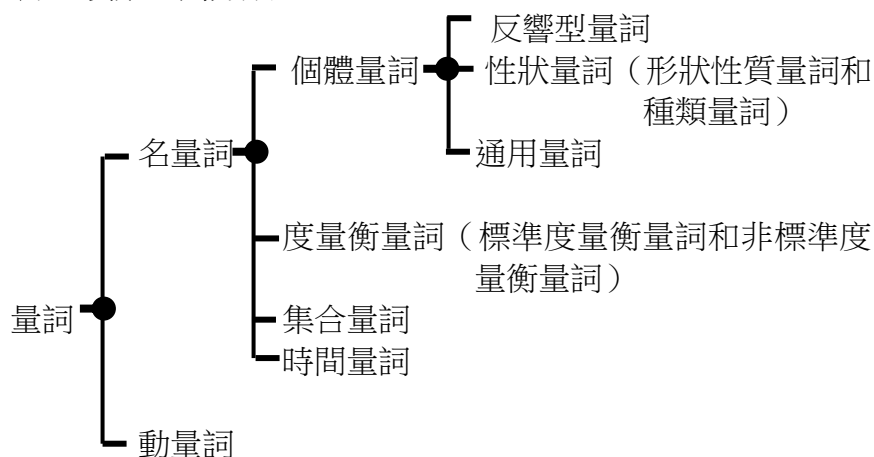
總之，量詞的歷時演變路徑證明量詞從實詞發展而來，總體上經歷了語義實在而特徵不明，到語義實在而性狀分明，再到語義實在而注重分類的過程。其中，確實有量詞經歷了進一步虛化和泛化的語法化過程。但是，這種泛化僅僅局限在個別量詞即通用量詞身上，如漢語共同語的「個」（「枚」的語法化已停止，又回到了性狀表義上；「個」今後如何發展需看語言事實的發展）。而且這兩個量詞在漢語十分豐富的整體量詞數目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例，通用量詞是很難取代其它量詞而獨居的。其次，通用量詞修飾的名詞在表義精確的要求下，依然需要與之對應的個體量詞來表達。

## 4. 量詞的發展與存在價值

### 4.1 量詞範疇的確立

量詞範疇的確立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50 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漢語編輯室所編《「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簡述》。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與研究，學界對量詞的分類雖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大體認可漢語量詞的以下分類（參見蔣穎 2009）：

表 2 漢語量詞分類



囿於所選材料的限制，量詞的數目並不確定、統一，如何傑(2000)認為量詞是個封閉的類，共有 789 個，何傑(2008)指出現代漢語常用量詞有 600 個；蔣穎(2009)窮盡式統計了《現代漢語量詞詞典》和《漢語量詞詞典》中的量詞數目，前者收量詞 629 個，名量詞 583 個，占量詞總數的 92.7%，後者收量詞 892 個；惠紅軍(2011)對 460 個量詞進行了研究。由此可見，漢語量詞至少有 600 個是可信的，其中名量詞占多數。此外，名量詞中個體量詞的發達和差異程度又反映了整個漢藏語系量詞的發達和差異程度。

漢語中各類量詞側重不同的語義指稱，是人們日常生活及生產必需的表達方式和手段。漢語量詞的語義含量主要體現在：(一)計量的精確化要求；(二)量詞的褒貶色彩；(三)性狀量詞的維度特色；<sup>6</sup>(四)臨時(借用)量詞的靈活性；(五)量詞重疊；<sup>7</sup>(六)量詞可以受到形容詞修飾；(七)量詞可以

<sup>6</sup> 為了使漢語量詞向英語的定冠詞「靠攏」，一些生成語法學者（如 Cheng and Sybesma 1999；Gebhardt 2011 等）不承認性狀量詞的合法量詞地位。

<sup>7</sup> 從跨語言角度來看，語法詞或功能詞一般不能重複，而名詞、動詞、形



成為構詞成分。這七點肯定了量詞語義指稱性的存在（參見 Her and Hsieh 2010），量詞已成為豐富或完善漢語詞義、構建多樣句法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單一的僅起限定作用的「冠詞」。

方言量詞的「准冠詞」、「類冠詞」、「冠詞」或「功能詞」說(參見劉丹青 2005；陳玉潔 2007；Li 2013 等)，事實上等於說，漢語中數百個量詞都將不復存在，都將質變為如印歐語系語言裏的冠詞或定冠詞。撇開不符合語言事實這一點不說，這種認識單從邏輯上講就不通。其中重要一點，就是他們完全忽視了量詞的語義內容。

## 4.2 新量詞的出現

漢語量詞數目眾多，大部分不能任意使用。與此同時，為了表義或傳達信息的需要，一些新量詞還不斷湧現（參見劉巧雲、李向農 2004），如：

- (62) 襲。如：一襲大衣
- (63) 扎。如：一扎啤酒
- (64) 款。如：一款手機、一款首飾
- (65) 季。如：一季美劇、第一季美劇

---

容詞和副詞等實詞可以重複(Lakoff and Johnson 2003: 127-128; Wu 2017: 343-344)，如：

- (1) a. He ran and ran and ran and ran.  
b. He is very very very tall. (Lakoff and Johnson 2003:127-128)
- (2) a. 宜宜相護何時休？  
b. 那個老師天天游泳。(Wu 2017: 344)

李艷芝、吳義誠

(66) 波。如：一波新疫情、一波風暴

(67) 大。如：一大看點、三大理念、四大原則、十大傑出青年

新量詞的出現說明量詞在漢語中的表義地位十分重要，量詞不僅不會逐漸「個」化，也很難向只有限定性功能的「定冠詞」方向發展。

### 4.3 量詞的存在價值

由量詞的過去和現在可以看出，量詞有兩大特點：指稱性與準實詞性（參見 Wu 2017）。這兩個特點使得漢語在運用數量短語進行傳達信息時更加精確、清晰。其中，指稱性是就量詞豐富的語義內容來說的。「量+名」結構中，不管哪個量詞，其側重的語義內容都指向了後面的名詞，對名詞有凸顯、強調、指稱的作用（Bisang 1999；張楨 2012；宗守雲 2012 等）。準實詞性是就量詞的語義特點來說的，這在漢語研究中早有定論，如呂叔湘(1953:6)將量詞歸為「副名詞」。Zhang(2013)和 Wu (2017)也認為量詞總體而言接近實詞範圍，可稱之為「準實詞」(semi-lexicality)。漢語，尤其漢語方言中，「量名」結構或光杆量詞的所謂有定用法都是受到量詞所在語用環境限制的：「量名」結構或者光杆量詞一旦脫離語境，根本不能達到傳達完整信息的作用。

此外，量詞範疇存在的價值還體現在：（一）二語教學與習得過程中，無視量詞的語義特徵和搭配特質必定導致不合語法的錯誤(Zhang and Lu 2013)；（二）從實驗角度來說，量詞所承載的語義信息在處理 [CL+N] 短語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 Tsang and Chambers 2011；Zhang et al. 2012；Hsu et al. 2014）。正如 Tsang and Chambers(2011:1078)所說，「量詞在純

粹的語法單位和意義承載單位之間佔據了一個中間狀態。」這就為量詞成為一種獨立的功能範疇提供了條件。

## 5. 結論

本文提供的共時和歷時發展事實清楚地表明，漢語量詞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其主要功能仍然是計量、分類和個體化。漢語方言中，所謂量詞的定指用法，顯然是誤將必須使用一定語境來輔助指稱的語用現象當作語言成分內部固有特徵的語法現象。有關量詞的「定冠詞」說單從邏輯上也行不通，因為這意味著漢語數百個量詞的語義內容都逐漸消失，最終演變為只擁有同一語法屬性即「有定性」的虛詞。若果真如此，這些語音和形態皆迥異的一個個詞項還有必要共存於漢語中嗎？因為一種語言裏的定冠詞總是有限的。再者，普通話是大多數人使用的通用語言，由於語言接觸、語言規劃和交流擴大化的需要，一些方言正逐步退出交際舞台，甚至消亡都在所難免。尤其在年輕一代中，方言使用範圍的縮小趨勢十分明顯；少數民族量詞型語言，由於使用人數有限和使用環境封閉，更不可能引領漢語量詞的發展方向。

最後一個問題是，漢語中哪一種詞類最有可能演變為類似於英語的定冠詞呢？答案只有一個——指示代詞。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隨著漢語指示詞的替代功能被廣泛應用，逐漸失去原有的指示功能，從而演變成「有定性」的形式標記（參見呂叔湘 1956，1985；Huang 1999；Tao 1999；Chen 2004；方梅 2002；Fang 2012；張薇 2012 等）。漢語指示詞最有可能發展成為定冠詞這個事實，也符合定冠詞一般由指示詞演變而來的類型學規律（參見 Greenberg 1978；Himmelman 1996；Diessel 1999）。

## 引用文獻

- 曹芳宇. 2010.《唐五代量詞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 陳 絨. 2002.〈從「枚」與「個」看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語文研究》4:33-35。
- 陳興偉. 1992.〈義烏方言量詞前指示詞與數詞的省略〉，《中國語文》3:206。
- 陳玉潔. 2007.〈量名結構與量詞的定語標記功能〉，《中國語文》6:516-530。
- 陳 躍. 2006.《紅樓夢量詞研究》，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 戴慶廈、蔣穎. 2005.〈論藏緬語的反響型名量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24-129。
- 戴婉瑩. 1984.〈量詞「個化」新議〉，《漢語學習》1:37-53。
- 董秀芳. 2013.〈從現代漢語個體量詞的名性特徵看其內部差異〉，《世界漢語教學》1:18-26。
- 方 梅. 2002.〈指示詞「這」和「那」在北京話中的語法化〉，《中國語文》4:343-356。
- 何 傑. 2000.《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何 傑. 2008.《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增訂版)》。北京：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
- 賀文平. 2006.《湘鄉(壺天話)中「隻+名」結構研究》，延邊大學碩士論文。
- 胡裕樹. 2011.《現代漢語(修訂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黃伯榮、廖序東. 2002.《現代漢語(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黃盛璋. 1961.〈兩漢時代的量詞〉，《中國語文》8: 21-28。
- 惠紅軍. 2011.《漢語量詞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蔣 穎. 2009.《漢藏語系語言名量詞比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金福芬、陳國華. 2002.〈漢語量詞的語法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8-14。
- 李宇明. 2000.〈拷貝型量詞及其在漢藏語系量詞發展中的地位〉，《中國語文》1:27-34。
- 李佐豐. 2003.《上古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 劉丹青. 2005.〈漢語關係從句標記類型初探〉，《中國語文》1:3-15。
- 劉丹青. 2008.《語法調查研究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丹青. 2011.〈語言庫藏類型學構想〉，《當代語言學》4:289-303。
- 劉丹青. 2012.〈漢語的若干顯赫範疇：語言庫藏類型學視角〉，《世界漢語教學》3:291-305。
- 劉巧雲、李向農. 2004.〈「大」字新用作量詞〉，《語文學刊》5:82-83。
- 劉世儒. 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呂叔湘. 1953.《語法學習》。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呂叔湘. 1956.《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 呂叔湘. 1999[2010].《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毛宗武. 2004.《瑤族勉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潘悟云、陶寰. 1999.〈吳語的指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25-6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錢奠香. 2002.《海南屯昌閩語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橋本萬太郎. 1985.《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邵敬敏. 2007.《現代漢語通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盛益民(待刊).〈漢語方言定指「量名」結構的類型差異及共性表現〉。
- 石汝傑、劉丹青. 1985.〈蘇州方言量詞的定指用法及其變調〉，《語言研究》1:160-166。
- 石毓智、雷玉梅. 2004.〈「個」標記賓語的功能〉，《語文研究》4:14-19。

李艷芝、吳義誠

- 孫宏開、胡增益、黃行. 2007.《中國的語言》。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鳳陽. 2011.《古辭辨》。北京：中華書局。
- 王 健. 2013.〈類型學視野下的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研究〉，《語言科學》12 (4):383-393。
- 王 健、顧勁松. 2006.〈漣水(南祿)話量詞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3:237-241。
- 王 力. 1954.《中國語法理論》。北京：中華書局。
- 王 力. 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王 力. 1989.《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汪如東. 2012.〈海安話中表定指義量名結構的變調及表情功能〉，《東方語言學》11:93-105。
- 王志芳. 2002.〈量詞「個」的使用泛化管見〉，《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49-51。
- 王志武. 1999.〈「個」的非量詞用法及其詞性〉，《煙台師範學院學報》3:94-95。
- 薛 健. 2003.〈量詞「個化」與「個」的語法功能及語法意義問題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
- 葉祥苓. 1988.《蘇州方言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1981.〈溫州方言的語法特點及其歷史淵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S1:107-123。
- 游汝杰. 2003.〈溫州方言語法綱要〉，游汝杰著，萬直純編《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游汝杰卷》，164-23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張 斌. 2010.《現代漢語描寫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 頴. 2012.《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 薇. 2012.〈海鹽話的指示代詞系統〉，《語言研究》3:95-99。
- 張文界、黎克橋陸. 2012.《現代越-漢詞典》。胡志明市：越南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玉金. 2001. 《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
- 趙 鵬. 2004. 〈春秋戰國金文量詞析論〉,《漢字文化》4:26-28。
- 趙日新. 1999. 〈說「個」〉,《語言教學與研究》2:36-52。
- 周明強. 2002. 〈漢語量詞「個」的虛化特點〉,《語文學刊》1:41-44。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宗守雲. 2012. 《漢語量詞的認知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sang, Walter. 1999.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ed. by Jadranka Gvozdanović, pp. 113-18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1129-1184.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509-542.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eds. by Guglielmo Cinque and Richard Kayne, pp. 259-2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rver, Norb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2001. *Semi-Lexical Categories: The Function of Content Words and the Content of Function word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iessel, Holger. 1999. The morphosyntax of demonstratives in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Linguistic Typology* 3.1:1-49.
- Fang, Mei. 2012. The emergence of a definite article in Beijing Mandar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 zhe 'this'. In *Newes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isation and Lexicalisation in Chinese*, ed. by Janet Zhiqun Xing, pp.

- 55-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rege, Gottlob. 1892. *Über Sinn und Bedeutu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ppears in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eds.). 1980.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Oxford: Blackwell.).
- Gebhardt, Lewis. 2011. Classifiers are functional. *Linguistic Inquiry* 42.1:125-130.
- Gerner, Mattias and Walter Bisang. 2010. Classifier declinations in an isolating language: On a rarity in Weining Ahma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3:579-623.
- Greenberg, Joseph H. 1978. Generalizations about Numeral Systems. In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ume 3: Word Structure*, eds. by Joseph H. Greenberg, Charles A. Ferguson and Edith A. Moravcsik. pp. 249-2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 One-Soon and Chen-Tien Hsieh. 2010. On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3:527-551.
- Himmelmann, Nikolaus. 1996.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 In *Studies in Anaphora*, ed. by Barbara Fox, pp. 205-25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u, Chun-Chieh, Shu-Hua Tsai, Chin-Lung Yang and Jenn-Yeu Chen. 2014. Processing classifier-noun agreement in a long distance: An ERP study on Mandarin Chinese. *Brain & Language* 137:14-28.
- Huang, Shuanfan. 1999. The emergence of a grammatical category definite article in spoke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1:77-94.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revised ver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Xuping.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i, Xuping and Walter Bisang.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marking. *Lingua* 122.4:335-355.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Roberts, Craige. 2003. Uniqueness in definite noun phras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6.3:287-350.
- Tao, Hongyin. 1999. The grammar of demonstrative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1:69-103.
- The Royal Institute. 2003. *Thai Classifier Dictionary (6th edition)*. Bangkok: Sahamite Printing Press.
- Tsang, Cara and Craig Chambers. 2011. Appearances aren't everything: shape classifiers and referential processing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7.5:1065-1080.
- Wu, Yicheng. 2017. Numeral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Semantic content, contextuality and semi-lexicality.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55.2:333-369.
- Wu, Yicheng and Adams Bodo. 2009. Classifiers ≠ determiners. *Linguistic Inquiry* 40.3:487-503.
- Zhang, Jie and Xiaofei Lu. 2013. Variability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7.S1:46-60.

李艷芝、吳義誠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Zhang Yaxu, Jinlu Zhang and Baoquan Min. 2012. Neural dynamics of animacy processing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ERP evidenc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fier-noun combinations. *Brain and Language* 120.3:321-331.

[Received 14 November 2016; revised 26 February 2017; accepted 2 May 2017]

李艷芝  
漢語習得與傳播研究所  
國際文化與教育學院  
浙江師範大學  
浙江省金華市  
bluewater0336@hotmail.com

吳義誠  
浙江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  
wuyicheng@zju.edu.cn

**THE DEFINITE INTERPRETATION OF [CL+N]  
EXPRESS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sup>1</sup> LI Yanzhi    <sup>2</sup> WU Yicheng

<sup>1</sup>*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Zhejiang University*

<sup>2</sup>*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t has been claimed in the linguistic literature that numeral classifiers in some Sinitic languages ar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to the definite articl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bare classifiers or [CL+N] expressio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definite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Based on our fieldwork on several Southern dialects in Mainland China, such as Wu, Xiang, Min and Yue dialect,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 the alleged “definiteness” is actually not the inherent property of numeral classifiers themselves, but is expressed via the pragmatic contexts; (ii) [CL+N] expressions or bare classifier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definiteness” out of context, and if placed in a certain context, can be stochastically understood as either definite or indefinite. (iii) it is certainly wrong to ascribe “definiteness” to a certain linguistic element such as “classifier”, “nominal” or even “numeral” when a bare classifier, a bare nominal, a [CL+N] or a [Numeral +CL+N] expression is construed as definite in a communicative context, since they constitute an essentially pragmatic phenomenon.

Key words: classifier, definite article, definiteness, pragmatic phenomenon, evolutionary process